

《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修华岳庙记》应为北魏文*

丁志军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成都 610064)

关键词: 修华岳庙记; 李商隐; 北魏

摘要: 《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修华岳庙记》既非李商隐文, 亦非唐文, 而应为北魏文。《集古录跋尾》所载《大代修华岳庙碑》、《宝刻丛编》所载《后魏修华岳庙碑》与《修华岳庙记》实为同一碑文。文中出现的“常英”为北魏人; “直勤”为北魏宗室成员的特有封号, “直勒”应为“直勤”之误; “侯尼须”为北魏宗室成员, 并与常英为同时代人。《修华岳庙记》作于北魏文成帝兴光元年九月四日至太安元年三月三日间。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2435(2010)01-0118-03

Record of Huayue Temple Construction in The Supplementary Volume of Fan Nan's Works was Written in Northern Wei Dynasty

DING Zhi-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China)

Key words: “The Record of Huayue Temple Construction”; Li Shangyin; Northern Wei Dynasty

Abstract: “The Record of Huayue Temple Construction”, collected by The Supplementary Volume of Fan Nan's Works, was not written by Li Shangyin, nor by anyone in the Tang Dynasty, but by someone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Record of Huayue Temple Construction” and other different versions in Jigulubawei and Baokecongbian are just the same article. Chang Ying was a perso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Zhi Qin was a peculiar appellation belonging to royalty at that time. Zhi Le in this article was an error for Zhi Qin. Hou Nixu was an imperial kinsman who lived contemporary with Chang Ying. “The Record of Huayue Temple Construction” was a work written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between September of the first year of Xingguang and March of the first year of Taian.

李商隐现存《樊南文集》十卷采自《文苑英华》、《唐文萃》; 《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系钱振伦、钱振常兄弟据《全唐文》所载李商隐文辑录而成。《补编·补遗》所收《修华岳庙记》并不见于《文苑英华》及《全唐文》, 唯孙梅《四六丛话》卷二十一有云: “商隐此《记》, 《樊南甲、乙集》无之, 独见于《华岳全集》, 为诸家搜罗之所不及。”^[1]钱氏兄弟以此将《修华岳庙记》收入《樊南文集补编》^[2]。据此, 有学者遂推定李商隐在开成元年“极有可能受常英、荀尚、侯尼须等人之预请而撰写此文”, 认为《修华岳庙记》“反映了唐开成元年重修西岳庙的情况, 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为研究李商隐早年的骈文创作活动和早年骈文风格提供了重要材料, 填补了现存李商隐文章中无‘记’文体的缺憾, 有助于了

解李商隐骈文的文学性特点。”^[3]笔者认为, 在未能确认此文创作年代的情况下, 这种评价值得斟酌。

一、《修华岳庙记》并非唐代文章

(一) 《修华岳庙记》不应为李商隐文

钱氏在《修华岳庙记》篇题下加按语曰: “文中有‘开成元年’句, 考大和九年王茂元出镇泾原, 其明年即开成元年, 义山正在茂元幕中, 自泾至华, 地亦不远, 此时地之相及者也。”^[2]然据《李商隐诗歌集解》所附《李商隐年表》, 李商隐开成二年进士及第, 开成三年春方入王茂元幕,^[4]在“时”与“地”上皆无法成立。此其一。《记》中有“命史臣为之颂”之语, 而

李商隐开成元年尚未及第，既不可能有“史臣”身份，亦不得奉旨作文。此其二。由此可见，钱氏所收《修华岳庙记》为李商隐文的可能性较小。

（二）《修华岳庙记》不应为唐文

钱氏不能自圆其说，又提出《修华岳庙记》为开元间作品的推测，曰：

……文云‘阐皇风于五叶’，则当为玄宗。《旧唐书·玄宗纪》，先天二年九月封华岳神为金天王，是年十二月改元开元，岂‘开成’即‘开元’之伪耶？^[2]

刘学锴、余恕诚先生《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所列《李商隐文存目》颇赞同钱氏关于“‘开成’即‘开元’之伪”的推测，并进一步提出“误‘李尚隐’为‘李商隐’”^[3]的猜测。

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开元元年（亦称“先天二年”）九月一日为“辛酉”日，如此推算，则开元元年无“戊戌”日。^[4]可见，“‘开成’即‘开元’之伪”的推测颇值得商榷。作为唯一标识文章写作年代的“开成元年九月戊戌”之语，不能证明《修华岳庙记》出于唐代文人之手。

二、《修华岳庙记》应为北魏文章

对《修华岳庙记》归属的论证，必须跳出“大唐”、“开成”（或“开元”）等时代限定，并提出实质性证据。

（一）宋代对《修华岳庙记》的记载

北宋已有《修华岳庙记》一文的相关记载，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载《大代修华岳庙碑》，跋曰：

右大代修华岳庙碑。……其曰阐皇风于五叶者……故以为世也。……魏自道武天兴元年议定国号，群臣欲称代，而道武不许，乃仍称魏。自是之后，乃仍称魏，无改国称代之事，今魏碑数数有之，碑石当时所刻，不应妄，但史失其事耳。^[5]

欧阳修所见为碑文真迹，“代”即北魏的别称，跋语中引用碑文“阐皇风于五叶”之语，正与《修华岳庙记》所言相同。又南宋陈思《宝刻丛编》卷十载《后魏修华岳庙碑》，跋曰：

不著书撰人名氏，后魏兴光元年，诏遣侍中、辽西王常英，析曹尚书荀尚等重葺岳庙，二

年立此碑。^[6]

此碑系陈思转录自欧阳修《集古录目》，跋语中所言“常英”、“荀尚”皆与《修华岳庙记》所载相同。《金石录》亦有《后魏华岳碑》，题为“兴光二年三月”。^[7]由此看来，《大代修华岳庙碑》、《后魏修华岳庙碑》、《修华岳庙记》、《后魏华岳碑》本为同一碑文，并足以证明《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修华岳庙记》为北魏作品。自钱氏兄弟以来，治李商隐文者无人提及上述两则文献，恐怕与碑文数易其名有关。

（二）对《修华岳庙记》所载人名的考索

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上，考索《修华岳庙记》中所载人名，可进一步明晰该文的时代归属。

《修华岳庙记》中有“元舅侍中、太宰、征东大将军、辽西王辽西常英”。按《北史》卷二《魏本纪二》，太安元年，“以辽西公常英为太宰，进爵为王”。^[8]又《魏书》卷八十三上《外戚列传》第七十一上：

先是，高宗以乳母常氏有保护之功，既即位，尊为保太后。兴安二年，太后兄英，字世华，自肥如令超为散骑常侍、镇军大将军，赐爵辽西公。^[9]

同卷又曰“英为长兄”，常英之称“元舅”，即缘于此。如此，则《修华岳庙记》中常英的“元舅”、“侍中”、“太宰”、“辽西王”等称谓皆与《北史》、《魏书》所载相合。毛凤枝《关中金石文字遗存考》卷八首次考证出“常英”为北魏人，并与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相印证，得出《修华岳庙记》为北魏文的结论，^[10]研究李商隐文者亦未能引用。

毛氏论证尚不够充分，今更考“直勤侯尼须”、“荀尚”二人如下。文中有“立节将军、安定侯、直勤侯尼须”。“直勤”无考，但“直勤”一词却屡见于《魏书》、《北史》。《宋书》卷九五“校勘记”第三十七条认为，直勤“皆魏主子弟之称”。^[11]据罗新《北魏直勤考》，“直勤”实际上是北魏特有的一种称号，贯于人名前，作为具有特殊身份的宗室成员的象征。罗氏认为，史书所见之“宜勤”、“宜勤”，皆为“直勤”之形讹。“直勤”这一名号涵盖了全部北魏宗室成员的范围，即全部神元帝力微子孙的后代，中华书局的校勘记所谓“皆魏主子弟之称”的说法不够准确。^[12]由此可以推断，《修华岳庙记》中的“直勤”为“直勤”之形讹的可能性较大。

又《元宁墓志》称：“宁字阿安，武阳侯渴洛侯曾孙，始平公侯尼须之孙。”^[15]何德章认为，“从元宁姓氏、祖先名字任官、本人任官经历及‘河南洛阳人’的地望，我们可以断定，他属于北魏宗室。”^[16]而元宁为“侯尼须”之孙，则此墓志上所指“侯尼须”亦应为北魏宗室成员。墓志作于孝明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照此推算，“侯尼须”与常英为同时代人。故颇疑此处所指元宁祖父“侯尼须”即《记》中提及的“侯尼须”，“侯”、“侯”为形讹。不合之处在于《记》中所称“侯尼须”为“立节将军、安定侯”，此墓志所称则为“平远将军、散骑常侍、殿中尚书、冠军将军、始平公”，盖时代变迁、地位差异所致。

“冠军将军、礼曹尚书、河内公河内荀尚”一人，现有关于北魏的史书未见记载，而《宝刻丛编》卷十《后魏修华岳庙碑》，跋语称“析曹尚书荀尚”^[8]，“荀”、“苟”之异当为形讹所致。史载荀氏、荀氏皆出于河内。《通志·氏族略四》：“荀氏，《国语》云黄帝之后，有荀实、荀参。或言以河内多荀杞，因以为氏。”^[17]因《宝刻丛编》所载在前，姑作“河内荀尚”。

三、《修华岳庙记》的写作年限

《记》中称帝王“阐皇风于五叶”，即此帝王为北魏第五世皇帝。自北魏建国称帝之时算起，开国道武帝拓跋珪为一世，则“阐皇风于五叶”指文成帝拓跋濬。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四载《大代修华岳庙碑》，跋曰：

按《魏书》文成帝兴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为太安，故《魏书》兴光无二年，而此碑云二年三月甲午立者，盖立碑后六日始改元也。其曰阐皇风于五叶者……故以为世也。^[7]

按欧阳修所述，此碑立于太安元年三月甲午，即三月三日，碑文的写作时间当在太安元年三月三日前。陈思称重修华岳庙在兴光元年。《修华岳庙记》中有“元年九月戊戌”，兴光元年九月“戊戌”即为九月四日。则《修华岳庙记》的写作时间当在文成帝兴光元年九月四日至太安元年三月三日间。如此正与“阐皇风于五叶”相呼应。

以《修华岳庙记》为李商隐文者，首见于明

代《华岳全集》。据《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六，该集“旧本题华阴县知县李时方撰”，而“书多舛错”。^[18]伪误盖始于此。由此可得出以下结论：《樊南文集补编》所收《修华岳庙记》既非李商隐文，亦非唐代文，而属北魏兴光元年九月四日至太安元年三月三日间的作品。据《华阴县志》载，开成元年确有重葺岳庙之事，文中“大唐”、“开元”等语极有可能是篡改所致，至于为何伪误为李商隐的作品，不得而知，大约与李商隐常游华山并留下题名有关。

参考文献：

- [1] 孙梅. 四六丛话[M]. 北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 1937: 375
- [2] 李商隐. 樊南文集补编[M]. 钱振伦、钱振常笺注. 《四部备要》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89: 150.
- [3] 莫道才. 关于李商隐骈文佚作《修华岳庙记》[J]. 《柳州师专学报》1997(4): 17—18
- [4] 刘学锴，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M]. 2 版. 北京：中华书局，2004: 2235—2236.
- [5] 刘学锴，余恕诚. 李商隐文编年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2357.
- [6] 陈垣. 二十史朔闻表[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93.
- [7] 欧阳修. 集古录跋尾[Z] // 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 1142.
- [8] 陈思. 宝刻丛编[Z]. 刊本. 吴兴：陆氏，1888(光绪十四年): 34.
- [9] 赵明诚. 金石录[Z]. 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1: 39.
- [10] 李延寿. 北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68
- [11]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1817
- [12] 毛凤枝. 关中金石文字遗存考[M]. 刻本. 会稽：顾氏，1901(光绪二十七年): 310—312
- [13] 沈约. 宋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2364
- [14] 罗新. 北魏直勤考[J]. 历史研究，2004, (4): 24—38.
- [15] 赵万里. 魏晋南北朝墓志集释[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40
- [16] 何德章. 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M]. 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七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135—141.
- [17] 郑樵. 通志二十略[M]. 王树民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9.
- [18]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 661